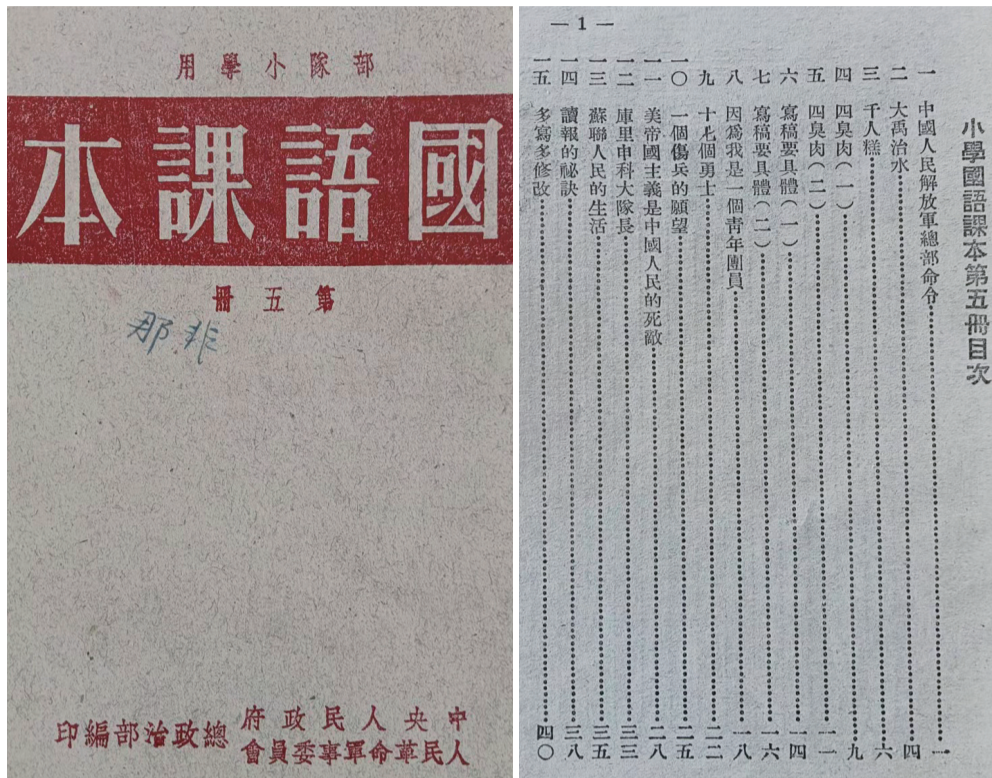


海陵旧话

崇川往事

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部队小学课本

□夏俊山



《部队小学用国语课本》书影

笔者收藏了多种课本，从一位海安市民手中购得的部队小学用的课本，无疑极有特色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解放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。有资料表明：当时，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%，干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8%，军队中文盲、半文盲就占了30%。

为了提升解放军官兵的文化水平，1950年8月1日，毛泽东签署了中央军委《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》，指出：“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、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……中央决定，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，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，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，使军队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，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，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，参加文化学习。”此后，军队开始有计划地普及中小学教育，在全军掀起了文化学习高潮。

笔者手头的部队小学课本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。跟后来的“统编版”“人教版”“苏教版”“北师大版”等诸多版本的教材不同，部队小学课本系“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编印”，名称也颇为别致，一是《算术课本》，一是《国语课本》（见上图）。常见的课本标明使用的年级，部队小学课本不标年级，却标上“课本”二字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军队

掀起学文化高潮。当时，提出的学习口号都有火药味，如“向文化进军”“攻占文化山”等，学习过程中，教员、学员都把生字叫“敌人”，把难认难记的字看作“敌人碉堡火力点”，认识这些字叫“攻碉堡”。教育形式上，部队除了注重招收知识青年外，主要采取了成立文化教育机构、创办速成学校等办法。以祁建华为代表的“速成识字法”等各种教学方法也应运而生。算术课采用“速成算术教学法”，基本做法是：在学加减乘除计算时，先集中时间背熟两个（加法和乘法）九九表；课堂教学精讲多练；应用题尽量选跟部队生活相关的事出题……

1950年，军队干部战士学文化主要使用两套教材：《部队小学用国语课本》《部队小学算术课本》。笔者手头的这册“部队小学用国语课本”系1951年10月再版，没有定价，应该是免费发放的。该册课本1~3页是“编辑说明：国语课本共编六册，供给水平不同的干部战士分别使用，大体学完之后，即可达到高小毕业的程度（以能认识两千字，阅读两千字以上通俗的记叙文、论说文，并能写五百字以上通俗明白的文字为主要标准）”。学完六册课本的时间也有说明：“一般部队，共需820小时”“一般离职速成学校，共需1050小时”。此外，还有对教学方法的说明：“需要多多提倡

自学互助活动。教员只应该用不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去讲课。”

再看《部队小学用国语课本》的内容，以32K的第五册为例，共28篇课文加一则“附录”，占91页。课文目录：1.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。2.大禹治水。3.千人糕。4.四臭肉（一）。5.四臭肉（二）。6.写稿要具体（一）。7.写稿要具体（二）。8.因为我是一个青年团员。9.十七个勇士。10.一个伤兵的愿望。11.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。12.库里申科大队长。13.苏联人民的生活……每篇课文后面有“注解”“说明”“作业”，作业大多为3题。附录为“怎样做读书笔记”。

1951年，部队文化教员祁建华摸索出利用注音符号的“速成识字法”，西南军区试行祁建华“速成识字法”，成效显著。1952年5月，中央教育部发出《关于各地开展“速成识字法”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》，全国总工会也发出《关于在工人中推行“速成识字法”的通知》。“运动式”的学习迅速展开。文化学习告一段落，各连部都会召开文化学习贺模大会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解放军发扬注重学习、善于学习和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光荣传统，把干部战士学文化作为“一个光荣的战斗任务”，海安市民的这部部队小学课本大概是他父亲当年在部队发的，这是当年军队开展大规模文化学习运动的见证啊，虽然它使用的时间不长，但留给我们的记忆却是不可磨灭的。

一本逃过熊熊烈火的禁书(下)

□徐继康

就这么一个人，朝廷却要和他的书，处以最高刑罚——禁毁。难道范方的书里，有什么“语含诽谤，意多悖逆”“纰缪之处不堪枚举”，还是唱衰大清，多有“不法语句”？

根据当年《外省移咨应毁各种书目》，《默镜居文集》在“应毁”级别。但不知道什么缘故，还是有数本逃过熊熊烈火、被保存了下来，真是千幸万幸，今天分别收藏在国家图书馆、复旦大学与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，这让我们在二百多年后能一睹此书的真面目。

书很薄，仅四卷，九十四个筒子页，收录了五十六篇文章，其中序（作品的自序十七、为朋友序三、送两侄赴任序二）二十二篇，论七篇，跋四篇，书后两篇，信札八篇，赞三篇，记一篇，杂文两篇，传五篇（其中一篇曾祖父的合传为父亲范崇式遗笔），为父亲写的行述一篇，为自己写的生圻志铭一篇。全书绝大部分内容关乎经史学术，还有一些是对朋友及自家的记述。即使给朋友的书信，也大多都是讨论学问的，没有涉及时事和政治。

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范老先生研究了一辈子诗经，好像一首诗也没写过，最起码没有一首诗留存下来。这说明他的性格很瓷实，不喜欢空空泛泛的虚言。这倒有一个好处，对那些喜欢咬文嚼字的官员来说，实在没有把柄可抓，没有空隙让他们去倒海翻江。

我曾把这本书逐字逐句地读过，实在没有什么违碍之句。甚至在字里行间，还读出他对当朝政令的满意。年近八十时，范大成、范大士到外地赴任，他兴致勃勃为两侄各写了一篇送行序，嘱咐他们到任后要“亲亲，长长，而仁民，而爱物，而措之裕如”。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范方一辈子尊崇的就是圣贤之道。

当然，此书对当地文史研究有一定的价值，比如一篇《水绘园记》罕为人知，黄仙裳坐馆“春草轩”（范方小叔范是式的别业）时的细节与心绪，邵潜生卒年最准确的记载就在他那篇《邵山人传》里。

说穿了，这就是一本范方的学术杂文集。

其实在他七十八岁时，《默镜居文集》曾由如皋知县周振庵捐资刻印过。“四库”开征，他整理徐光启《毛诗六帖讲意》的《诗经六帖重订》也被两浙总督所采进，只是四库馆臣认为“六帖仅存其五，与光启作书之意全不相

合”，故存书目而未收全书，但也足以说明官方对范方的认可。

谁知几十年过去，《默镜居文集》竟成了一本有毒的书。

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时间回到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，七十岁的兴化著名诗人王国栋来到如皋，寓于范氏古澹园，一个名叫范毓玠的人捧出一堆书稿请他作序。这位范毓玠就是范方的重孙，十五年前王国栋刚到如皋时，就认识了他的父亲范昶。范昶是范方第三子范安素之子，嗜学工文，曾任翰林院待诏。那个时候，王国栋就知道有一本《默镜居文集》，只是由于年久，原先雕版已经漫漶不清，所以一直深以不得把读为恨。范昶也担心先人著作毁于蠹蚀，便把祖父一些未梓的杂著抄录誊写，收拾整理，前后几历寒暑。范昶六十七岁去世后，文稿传到范毓玠手中，他把父亲整理的那部分加入《默镜居文集》，决定重新刻板印行。就在上一年，他已经请远房堂兄、乾隆十九年进士范曾辉作了序。此时恰逢王国栋来皋，他是父亲的故旧，而他的父亲王仲儒又是曾祖父的好友，正是作序的最佳人选。王国栋心感世谊之久，又敬范方治经之精，写序更是义不容辞，二话没说，洋洋洒洒为序一篇。在序文中，他追忆父亲与范氏的文墨雅事，又回顾了自己与范昶的往来交游，他对范方的治学成就充分肯定，对范氏子孙的孝行给予鼓励，认为这本《默镜居文集》，在“今圣天子崇尚风雅，以诗取士”的时代，“尤足以挽颓风而励末俗”。

这其实是一篇应付人情且无关痛痒的序文，却不料因为它，惹了大事。

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八月，栢茶徐述夔“一柱楼诗案”爆发，徐述夔作品全部销毁。因为王国栋曾为徐述夔的《一柱楼诗集》作序，徐述夔又为王国栋诗集《秋吟阁诗》作序，所以关于王国栋的著作也被查禁了。不仅他本人的作品，只要与他搭边的——所编的、所订的、所序的、所跋的，也一律查禁销毁。很不幸，《默镜居文集》那篇王国栋的序文正大张旗鼓以手书体刻在卷首，这自然难逃稽查官员的火眼金睛，不由分说，便把《默镜居文集》扔进熊熊的烈火里。同时扔进去的还有丰利场汪之珩的《文园六子诗》与《甲戌春吟》，因为这两本书也是王国栋参与商订的。但相比起它们片纸无存的命运，《默镜居文集》是何等的幸运，竟然还有漏网之鱼。

这本普通小书，如今静静地躺在历史的一角。泛黄的书页中，永远封藏着昔日一段黑色时光。它的遗世独立，不是身体里的文字，而是缠绕在文字之上那些看不见的东西。